

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丛书

近代中国

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

Press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Its
Origin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邵志择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丛书

近代中国

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

Press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Its
Origin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邵志择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 / 邵志择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308-09155-8

I. ①近… II. ①邵… III. ①报刊—思想评论—中国—近代 IV. ①G219.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236 号

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

邵志择 著

责任编辑 徐 婵(xuchan@zju.edu.cn)
文字编辑 徐 霞
封面设计 卢 涛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05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155-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接引作用	9
一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的理由	10
二 传教士的早期出版事业对中国人的影响	17
三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传教士的新闻出版业及其影响	24
四 同治中兴至维新变法时期传教士办报取向的改变	35
五 小 结	45
第二章 同光之际沪、港报人群及其办报理念	48
一 香港报人群:近代报人中国报人的第一次聚集	49
二 同光之际的《申报》报人群	62
三 小 结	79
第三章 办报:上书建言的另一种方式	
——从王韬开始的近代报刊文人论政取向	86
一 墨海书馆时期王韬对新闻纸的认识	87
二 1862年以后王韬对新闻纸的看法	91
三 上书论政办报论政	98
四 上书情结与报刊论政	108
五 小 结	115
第四章 从译报到官报:官绅互动中的权力与报刊	118
一 晚清官方的译报惯例及其影响	118

二 官方对报刊的控制与利用	139
三 小 结	153
第五章 维新报人群与文人论政办报模式的形成	156
一 维新报人群形成的政治背景	156
二 以《时务报》为核心的维新报人群	159
三 维新报刊合力的形成	166
四 维新报人群的特点	177
五 文人论政办报模式的成型	186
六 小 结	196
第六章 宪政框架下的报刊思想	
——以梁启超立宪时期报刊思想的转折为例	199
一 戊戌时期	200
二 《清议报》及《新民丛报》前期	202
三 政党报刊的尝试：从《时报》到《政论》	210
四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中流社会的报刊功能	218
五 权力的对立面：宪政框架内的报刊地位	221
六 小 结	227
第七章 结 语	231
一 近代知识分子与权力	231
二 权力的变迁与近代报刊及报刊思想的发展	234
三 报刊现代化的目标：权力结构中的独立力量	243
后 记	246
参考文献	249

引言

一般认为中国人本着文人论政精神创办自己的报刊就是中国近代报刊思想起源之时,《循环日报》被认为是第一份这样的报纸,所以近代报刊思想的源头自然就追溯到这份报纸以及它的主要负责人王韬。戊戌维新时期被广泛地认为是近代中国报业的第一个高峰,标志着政治家开始登上报坛,因此,维新政论报刊的勃兴被认为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这两种观点自然有充分的理由,不过我以为这样的认识或许还有补充的需要。

首先是如何看待西方的因素。众所周知,具有现代意义的报刊是西方人带入中国境内的,早于中国人自己办报至少半个世纪之久。在这些报刊上也能看到外人呼吁中国人重视举办这类西方式报刊的声音,但是这些西方报刊形式以及吁请中国人办报的声音在同治中兴以前没有得到中国人积极的回应。西方人在中国办报的主体是传教士和商人,外文报刊因文字隔阂对中国人影响甚微,中文报刊则因其针对中国读者,并且在内容上广泛涉及中国事务,对中国近代报业产生诸多影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这种影响还处于萌芽期,一旦时机成熟,西人报刊及其办报观念的示范作用便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了,这是同光之际中国人自办报刊意识觉醒的前因。

问题是,当我们探讨中国近代报刊思想起源问题时,因“中国”这个概念,如何看待西方因素的影响就稍费思量了。西方因素可以纳入我们所说的“中国”吗?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西方列强被视为侵略者,从事出版事业的外国人自然就是文化侵略者,说他们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很难让中国人接受。但是蒋廷黻先生曾指出,中国近百年的根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蒋先生是以西方文明为近代化标准的,他认为如果能够赶上西洋人,能利用科学和机械,能组织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话,中华民族的前提就

是光明的,否则就没有前途。^① 郭廷以先生也说,如果撇开西方文化,中国近代化的内容也就所余无几了。^② 他们都认为中国近代化离不开西方的因素。从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的近代发展历程也确实离不开西方因素^③,如果承认这一点,也就很难认为报刊思想可以例外。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新闻思想史所找寻到的“中国”报刊思想的源头基本上没有外人的地位,外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现代报刊这种出版形式。我以为,即使外人(主要是传教士)没有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内层,他们在思想的表层也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具体到报刊思想,外人至少起了接引西方报刊思想的作用,只是碍于民族、文化、政治等因素,这种接引作用很少得到正面的承认。于是,把中国人自己办报第一人的王韬作为近代报刊思想的源头也就顺理成章了。^④ 马克·布洛赫问道:“‘起源’仅仅意味着开始吗?”他又问:“另一方面,起源是否指原因呢?”^⑤ 我以为开始与原因都是应该考虑的,开始是一个时间点,而原因则是这个时间点背后的因素。王韬以及《循环日报》是近代中国报刊思想源头的点,这没有什么疑问,但是简单地说是这个点就是源头并不符合实际,因为包括王韬在内的第一代中国报人经过了传教士报刊以及外人商业报刊的熏陶,《循环日报》也是在香港多份商业性中文报纸的基础上才出现的。如果说王韬等人及《循环日报》的办报思想源自西方人在中国的报刊实践但是经过中国因素的转换,这是比较能够令人接受的。

其次,所谓起源也应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即使从王韬开始,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过程至少到维新时期才算基本完成。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如下认识:从中国人自己开始办报的同光时代到甲午以后的维新时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办报思想大抵受制于两个因素,一是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⑥,一是儒家知识分子向上建言的心理定势。一方面,我们从王韬、陈葛廷等人的办报动机中可以看到民族意识的冲动^⑦,而甲午以后维新报刊的勃兴受到败于日本而引发的民族、国家乃至文化耻辱感也是十分明显的。进而言之,这两个前后相继的时期所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以抵御外侮为特点,中国士人的底气就是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经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 史家一般都认可中国近代史以1840年为起始点,这一论断本身就已经肯定了西方的因素。

④ 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个源头可能要追溯到林则徐,但是林则徐对报刊的认知仅限于译报,把西人报刊看做是获取情报的工具。从办报观念来说,林则徐没有提供任何资源。

⑤ [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这位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似乎对历史起源的追溯不以为然,但是他在此提出的开始和原因这两个起源因素仍具有启发意义。

⑥ 真正的民族主义是庚子以后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才逐渐形成的,前此的民族意识大多只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初级形态,姑且称之为朴素的民族情绪。

⑦ 具体见本书第二章“香港报人群:近代中国报人的第一次聚集”一节。

不让与外人,这在维新时期更为激烈,我把这种情感称为外倾型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而言,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民族意识则是内倾型的,它以建设现代民族国家为首要目标,排外的情绪有所抑制。^① 新文化运动以后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话语逐渐占据各个知识领域,这对后人书写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起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同光时代和维新时代报刊中那种民族的因素很容易得到高度的认可。另一方面,儒家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心理定势也一直影响到民国时代,即使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没有在根本上减低它的效用,王韬,尤其是维新报人恰恰在文人论政这一点上开创了先河。因此,本书把王韬等人自办中文报刊至维新报业勃兴这一较长时段看做是近代报刊思想的起源过程。中国近代报刊思想是近代许多中国人(包括官员在内)对报刊的各种理解的综合,因此也不能忽视从林则徐开始的官方译报传统以及它对知识分子办报思想的影响。此外,除了从事报业的知识分子群体之外,一般的知识分子对报刊与新闻的功能也有许多论述。总之,近代报刊思想的起源应该是综合性的,并不是单点、单线的发展。

至于近代报刊思想的转折,首先的问题是:何谓转折?有没有转折?我所理解的报刊思想的转折,是指对原有报刊思想的根本性转变,或者说是方向性的改变。如果说王韬和维新报人在报刊实践过程中产生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报刊思想,那么这种思想是什么,它有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改变?在何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戊戌变法时期的政论报刊勃兴固然是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有许多新动向产生,比如高级知识分子加入报界、言论的功效巨大、与政治的关系密切等。但是仔细考察当时的办报情况,就会发现维新报人的办报取向与王韬等人并无本质的不同,都属于向上建言性质,是在既有的权力框架之内谋求报馆之有益于“国事”,而从同治中兴至维新变法时期所谓的“国”还只是朝廷,并不是民族国家。维新派虽有初步的民权思想,但是尚未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处体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延续了清末以来“自改革”的思路,只是手段较为激烈而已,而且康式政治手段与王安石变法路径基本相同。^② 政治思想和政治手段没有根本的变化,报刊思想也就谈不上根本的变化。

^① 这当然与义和团极端排外所带来的后果有关,事实上,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基本上反对义和团和清廷的做法。至于宣统年间的路权争夺固然含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但是路权斗争的锋芒却大半指向朝廷及地方官府。

^② 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路来看,他并没有跳出传统改革的基本进路,因此当清末民初宪政思想主导政治改革(革命)时,康有为就明显地落伍了。维新时期当然也有少数超越时代的人,比如严复和谭嗣同,但是戊戌维新毕竟是康、梁等人主导的变革。“自改革”这一概念我沿用的是朱维铮教授的解释,可参见其所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走出中世纪二集》等书中的有关文章。

所以,我认为维新时期的报刊思想只是强化了既存的言论报国也即向上建言的办报取向,尚无根本性的思想转折。

与维新时期相比,清末立宪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思想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特质。第一,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家不再是朝廷而是民族国家,国家主义思想开始兴起,这一思想上的转折所确定的方向至今依然。第二,宪政的尝试使得政治结构发生根本的转变,西方民主思想较为系统地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之中并付诸实际政治,而且立宪的动力越来越大,既有的权力框架再也无法容纳。这才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此前的戊戌维新只是利用了部分民权学说而已,而且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中并没有付诸实际。第三,立宪时期出现了较大的社会空间,社会力量的壮大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虽然最后清政府仍然坚持其专制权力的至上性,但是也因此而致其速败。对于一个数千年专制统治体制彻底瓦解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认为期间的政治、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近代中国报刊思想在立宪时期也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本书的基本思路

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源自来华新教传教士所办的报刊,这些传教士对西方国家的报刊情况以及报刊思想无疑有一定的认识。事实上,派遣他们来华传教的教会组织本身就十分重视利用出版书籍、小册子以辅助传教,马礼逊等人最早在中国出版小册和刊物也得到过英国数家专门资助海外印刷传教的宗教机构的支持。马礼逊等人受到西方现代报刊思想的影响也是没有疑问的。^① 马礼逊之后的传教士也大多对报刊的地位与作用有相当的了解,这在伟烈亚力、林乐知、花之安、李提摩太等人的有关文字中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传教士不仅在报刊形式上对中国人自办报刊有启蒙之功,在报刊思想上也多少有些影响,尤其是花之安与李提摩太等人对报刊的论述可以在康有为、梁启超、陈炽等人的有关文章中看到些许痕迹。^② 但是传教士报刊作为一种外来因素,又有宗教因素嵌入其中,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很难得到中国士大夫的认可,中国人所能接受的只是传教士刊物中有用的西学知识。传教士刊物在甲午前后积极参与讨

① 1833年,马礼逊曾在《广州志乘》上写了一篇题为《论印刷自由》的文章,认为“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这是为了使他们所创造的人类得到快乐。因此,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这个天赋的人权”,可见马礼逊对英国的出版自由理念是比较熟悉的。参见[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5页。

② 花之安《自西徂东》中的《新闻纸论》,李提摩太《时事新论》中的《论报馆》、《中国各报馆始末》、《报中杂论跋》以及《新政策》中对设立报馆的建议等都对维新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中国的时局与政治、教育改革,这才使得一些维新知识分子起而效仿。

由于文化及民族因素的影响,中国人自己对近代报刊思想起源的追寻必然在心理上预设中国自己的因素,这就像清末传统士大夫要从中国上古历史中找到源头然后才能勉强认可西学一样。我无暇考证中国近代报刊思想之源起于王韬之文人论政一说究竟始于何时,但是有一点大概是清楚的,即这一认定肯定是在民族主义^①高涨的时代。鉴于民国以后一直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又由于认定这一说法的肯定是知识分子,我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族主义因素与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在书写近代报刊史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王韬到了晚年仍担心自己身后“速朽”,因此汲汲于刊刻自己的著述,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日后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会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王韬之所以被追溯为报刊思想的源头是因为他有着强烈的政治情结,在关注政治、依托权力以期实现自己政治抱负这一点上,王韬与后来的数代知识分子并无太大的差异,这是他在报刊上撰写政论、时论能够得到后世认可的关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百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大有我辈不出如苍生何的气概,这很容易使他们倾向于接近权力,利用权力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也因为这样,作为一个整体的传统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实际权力的附庸,成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事实上很难施展自己的作用。王韬的幸运恰恰在于他千方百计要出而用世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终身处于官僚体制之外,虽然自身潦倒不得志,但在新闻史上毕竟留下了不可取代的地位。

王韬是矛盾的。在传统的权力体制下,文人论政之说本身也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在维新时期体现得较为充分。《时务报》的政论风靡一时,对维新舆论的激发之功不言而喻,然而在权力之外的论政最终导致的却是康有为等人进入到权力的中心,一旦进入权力,则报刊也就不再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成为文人施政的工具。《时务报》改官报一事正是文人论政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报刊在权力之外与在权力之内完全是两个世界,文人的政治情怀有可能把自己送入政治权力圈,连带着论政的报刊也一同被纳入权力的藩篱。

清末预备立宪以前中国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有的只是官僚权力体系中的权力角逐。官僚体系是专制时代的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的最为重要的场域,康有为等人要维新政治制度也只有通过不断的上书以及上书式的报刊政论试图进入这一体系。换言之,《时务报》时期的报刊论政基本上是在既有权力体系之内的拾遗补缺式的向上建言。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的政治

^① 此处所说的民族主义不是针对满族的汉民族主义,而是面对西方列强的民族主义。

活动空间,所以“公车上书”是按照体制内的方式向都察院递交上书,康有为所做的主要工作也就是频繁通过有上书资格的官员上奏折。强学会被士大夫认为是传统的结党,结党是专制权力所不能容忍的,更何况强学会还与朝野政治派别有瓜葛。严复当时曾撰《论中国分党》一文,对比了中外所谓“党”的含义,最后认为中国千年以来的教化已老,所谓“党”岂能与东西诸国之各党相比。^①至立宪时期,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向来没有政治,也没有政治家。在主张立宪的人士看来,所谓政治就是“为图社会的独立之团体发达所取最良方法之术也”。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以西方政党政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以前只有官吏而无政治家,独立于权力体制的政治团体兴起之后才有政治,才有政治家。而广义的政治家则包括了“新闻记者、政党、主张一政策之学者”。^②新闻记者竟排名最前,这也充分表示了立宪时期报刊及报人的重要性。从立宪时期的实际来看,参与立宪活动的政治团体大多注重办报,而且视办报为第一要义。而这一时期的政党已经是西方概念,是在官僚体系之外的独立的力量,与康有为等人的“合群”概念有质的区别。^③由于政治气候及知识气候的变化,立宪时期引入了西方新闻观念中的许多关键概念,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第四种族(即第四权力)、监督政府、民意代表(舆论代表)等都得到过充分的阐述并运用于报刊实践。

政治空间决定了报刊运作的方式。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清廷的统治总体上趋于松弛,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有两点:第一,清廷面对危机不断寻求出路,言路势必有所放开。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丑变法(新政)到预备立宪,政治言论的表达空间越来越宽。洋务时期朝廷有所举措,民间报刊也多有议论,如《申报》、《循环日报》等,许多上书大臣的言事者也能得到提拔,正因为此,王韬才一再上书并在报上发表洋务意见。维新变法时期倡言维新几成士大夫时尚,朝廷也颇有不弃乌莛的态度。到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不仅破除了上书的限制,让天下士民都可以直接上书朝廷,而且谕令免除书报纳税,甚至还在上谕中鼓励官绅士民办报。^④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报刊才敢于大声疾呼。至新政及预备立宪时期,政治空间更加宽松,预备立宪的上谕中就有“庶政公诸舆论”之说,主张立宪的亲贵大臣载泽甚至向慈禧建议“给予新闻出版以完全的自

① 《论中国分党》原文载《国闻报》1898年7月31日8月1日,见王拭编:《严复集》第二册(诗文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7—490页。

② 刘薰和:《苦政治家与乐政治家》,《中国新报》1907年第一卷第7期。

③ 康有为等人的“合群”或许可称初期的政党活动,但是他们的活动更与传统党社相似,比如利用师徒关系、乡谊、年谊等,也与朝廷中的“朋党”关系密切。

④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2、87—88页。

由,使他们能批评和评论公共事务和政府官员的行为”。^①虽然清廷也在立宪时期制定了《大清报律》,对报刊言论以及报道多有限制,但实际上这部法律并未起到作用,租界内的报刊照样可以昌言无忌^②,因此形成了立宪派所称的“舆论政治”。第二,同治中兴以后的晚清社会在经济、文化上都逐渐引入了现代因素,尤其是立宪时期的社会基础与传统中国小农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换言之,西方式的市民社会虽未成型,但至少已渐露萌芽之势。^③近代西方经济的入侵客观上导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至新政以后,清廷也不得不奖励工商业。工商业的繁荣导致社会力量的壮大,以上海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到1911年,上海成立的商业团体达108个,其中1900年至1911年之间成立的就达41个。^④上海商界也与立宪派人士一起积极推动自治与国会请愿运动,在清末上海、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⑤商业聚集地的张园成为清末各种政治集会的主要场所,张园俨然已成为上海公共空间的代表。^⑥上海是同光之际报刊云集之地,是维新报刊的聚集地,也是立宪运动的基地,有较大影响的立宪派报刊大多出版于上海。而且立宪时期全国各地也出现了自维新变法以来又一次办报的高潮,阅报也更为普遍,并且于宣统年间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全国报界力量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办理会务的事务所设于上海),其他地方也成立了多个报界同业组织。^⑦作成于上和作成于下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得知识分子得以利用报刊这种新型的媒介来参与政治过程,报刊的运作也因此慢慢积累了现代化的因素,至立宪时期,这一积累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已经达到了西方现代化的水平。

中国近代报刊思想的发展与报人群体的状况关系密切,报人群的规模、特性、地缘以及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都是值得探讨的,他们对于报刊与新闻

① 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9页。

② 不仅是租界,就是没有租界的北京也呈现出无处不在的言论自由,光绪末叶的北京报纸“对于政治之得失,内外大员之善恶,皆可尽情指责;人民之冤抑,更可尽情登载”。参见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③ 关于中华帝国晚期是否出现了类似西方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美国学者玛丽·兰金、罗威廉、魏克曼、黄宗智等人都有专文讨论(参见学术期刊 *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但是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分歧较大,本书并未采用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

④ [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⑤ 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1905—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22期。

⑥ 熊月之:《张园——晚清上海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6期。

⑦ 赵建国:《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二章的有关内容。

的认识更与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息息相关,因此,考察近代以来的报人群体应是厘清报刊思想演变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张朋园曾指出:“知识分子是新观念的倡导者,因此他们在现代化迟缓的国家特别受到尊敬和重视。讨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便必须讨论知识分子的观念。换言之,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是相提并论的。”^①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转化西学的过程中结合了两本土的因素,一是国家自强的要求,一是儒家传统的影响。前者要求知识分子时时刻刻以摆脱困境为指针,因此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特别注重实用性。儒家传统的牵制力使得西学的转化过程既曲折也存在对西学的误读。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观念上的现代化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与知识背景中艰难前进的,报刊思想的现代化过程也是如此。正是基于知识分子在报刊思想现代化中的地位,本书特别注重报人群体的变化,试图把他们置于历史情景中来探讨他们对于报刊的认识。

本书以报刊能否成为权力结构性因素并独立发挥作用为理论依归,以此来关照中国近代报刊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尤其注重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从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报刊与权力的关系。

近代报刊史是新闻学科中研究得较为充分的部分,因此要在这一领域中有所创新比较困难,我只是在具体研究思路以及角度方面有所调整,对于文人论政一说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立宪派的报刊实践与报刊思想值得专门论述,但是考虑到本书的规模,最后还是以梁启超为例进行初步的探讨,因梁启超在这一时期的报刊思想与其他立宪派人士基本一致,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本书是在模糊的概念上使用“近代报刊”一词,具体而言上至传教士来华办报,下迄 1911 年,民国之后不在论述范围之内。之所以如此主要与本书论旨有关,我认为诸如新闻、言论、出版自由以及舆论监督、第四种权力等现代新闻观念在清末数十年之内都已经引入中国的知识界,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办报的概念工具,此后的中国知识界对这些概念均有较强的认同感,在他们投身报界时也都以此为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理念。换言之,清末的报刊思想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现代性,民国后尤其是国民党实行一党政治以后的党国、党报观念反而是倒退。也因为这样,我把清末立宪时期所形成的报刊思想看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

^①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 页。本书所用“知识分子”并非严格的西方意义中的知识分子,大体而言它相当于“士”。考虑到“士”与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在关心社会、政治以及批评精神等方面不无相似之处,为了表述方便而使用“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但是“士”与“知识分子”不是完全对应的概念,这是需要指出的。

第一章 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接引作用

中国近代新闻业受到西方人的影响是无可怀疑的,在西方人所办的现代新闻出版业中,传教士^①的中文出版事业最为引人注目。自马礼逊以后,传教士出版报刊的策略基本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定。一方面,他们办刊的最终目的无疑是传播宗教,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为了追求中国士大夫的认可,传播了许多与宗教没有直接关系的西学,正是这些西学吸引了士大夫。中国人办报在形式上受传教士影响,思想上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经过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内在转化,易言之,中国人的办报思想从精神内涵来看受儒家传统影响更大些。另一方面,传教士为了使他们在中国社会中发挥实际的影响,主动向权力阶层靠拢,逐渐通过向权力阶层条陈时政以博取官方的青睐,至广学会《万国公报》时期,他们事实上一度与权力高层走得很近,只差一个客卿身份。但是,由于他们的身份以及办报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的教化,权力阶层和一般士大夫始终对他们保持戒心,因此他们最终不可能进入权力层,也不能在中国的文化格局中取得地位。

具体而言,传教士的中文报刊经历了如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刊注重地理、天文等科学知识以及历史观念的传播,对中国士人的地理、科学观念产生较大影响。第二时期是两次鸦片战争之间。除了延续第一时期的传播内容之外,传教士报刊对新闻的重视程度提高,这一时期对近代中国第一代报人群的出现意义重大。第三时期是同治中兴至维新变法之时。传教士报刊在这一时期也注重科学传播,但其已不是重点,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们利用报刊有意识地向清廷建言献策,以此来影响中央和地方权力,这种努力至甲午以后与高涨的维新变革思潮合流,对维新变法报刊的勃兴

^① 本书所称传教士,如无说明均指新教传教士。

具有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这三个时期的演进中,可以看出传教士办报呈现出逐渐向中国儒家传统靠近、向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靠拢的倾向,当他们以及他们的报刊因历史机遇而触发中国文人向上建言的传统因而导致政论报刊勃发之时,他们在中国新闻业中的角色也差不多演完了。

一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的缘故

早期出版物的出版动因

第一份近代刊物是马礼逊和米怜主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下有时简称《察世俗》),在这以后新教传教士相继在南洋及广州出版的主要中文刊物有《天下新闻》、《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以下有时简称《东西洋考》),其他还有英文的几种刊物。除了定期刊物之外,更多的是中文小册子。新教传教士之所以热衷于出版宗教小册子和定期刊物,主要出于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清廷禁止在中国传教的禁令使得第一代来华新教传教士放弃口头传教,转而用印刷书刊的方式来传播教义。

从康熙八年(1669年)以后,天主教在中国逐渐遭到禁止,至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以后全面被禁止。^①雍正即位后更是厉行禁止天主教的传播。^②乾隆、嘉庆两朝也都沿袭禁教的措施。到马礼逊、米怜等新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时,他们面临无法传教的困难,只能考虑曲线传教。1813年,米怜来到中国,同年7月15日,马礼逊在给米怜的一封信中提议到南洋一带去开辟传教天地。^③于是米怜前往马六甲传教,他到达那里之后就按照与马礼逊商量好的计划准备开办一所学校、一处印刷所以以及出版刊物等,出版刊物成了曲线传教重要的环节。马礼逊和米怜在呈送伦敦会的章程中记录了关于出版月刊的计划,要求在马六

① 康熙八年八月的一道谕旨中说:“其天主教除南怀仁等照常自行外,所有直省复立教堂入教,仍着严行禁止。”(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九,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142页。)康熙五十九年对罗马教皇使臣的答复中称“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转引自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②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浙闽总督满保奏:“西洋人在各省起天主堂行教,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余具安插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飭。”谕令从之。参见蒋良骐:《东华录》卷二十五,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385页。

③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甲出版一份小型月报,以便传播实用知识和基督教。^①这就是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第二个原因是新教普遍重视印刷术的运用,又由于西方国家利用印刷术早已出版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报纸、刊物,因此,第一代传教士在传教困难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想到利用印刷技术来出版书籍和刊物。

自从路德改宗以来,新教普遍比较重视印刷术对于传教的作用。路德向教廷发出挑战之后,特别提出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亲自阅读《圣经》,以便从中领会上帝的旨意。当路德利用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技术印刷宗教书籍、发表文章来反对教廷、倡导宗教改革时,他曾由衷地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好的发明。”^②事实上,英国的出版自由思想的源头之一就是印刷术与宗教改革的关系中产生的。^③所以新教传教士到达中国以后,利用印刷品来传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第一代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时,西方国家的新闻出版业已经非常发达了,报纸和杂志在英国尤其盛行。宗教宣传小册子无论在英国还是海外,都被英国的新教团体认为是改变信仰的重要方式。^④在英国有专门从事推广传教出版物的协会,如英国宗教印刷协会(British Religious Tract Society)和大英圣书公会(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马礼逊、米怜等人的出版事业就曾得到过这两个协会的资助。美国也有类似的组织,如美国印刷协会(American Tract Society)和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这两个协会也都支持传教士在中国的出版事业。^⑤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由米怜编辑的,马礼逊本人也在广州、澳门积极从事出版活动。马礼逊自己在1833年编辑了一份英文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Evangelist & Miscellance Sinica*)专门报道中国传教的消息。另据苏精研究,马礼逊还出版过一种中文刊物《杂闻编》,出了3期,每期只有4页,内容是传教与一般知识,每期印刷20000份。^⑥另外,在马礼逊的倡议下,美国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创办了《中国丛报》,他也常给该刊写稿,同时也常给美国商人办的《广州志乘》(即《广州记录报》)写稿。

①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② Forms of Media as Ways of Knowing. In: John D. H. Downing and Ali Mohammadi Ann: *Questioning the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p50.

③ 我们从密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出版自由思想的新教因素。

④ Jane Kate Leonard; W. H. Medhurst: *Rewriting the missionary Message*,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ed): *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9.

⑤ Murray A. Rubinstein: *Propagating the Democratic Gospel: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Thought in China, 1830—1848*,《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2年第11期。

⑥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第19、51—52页。

同属第一代来华传教士的麦都思 14 岁即学习了印刷术,1817 年到南洋传教也是以出版宗教书籍为主要工作。1818 年以后,由于米怜身体不佳,麦都思曾经承担了大量的出版工作,包括《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编辑出版事务。米怜去世后,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出版了《特选撮要每月统记传》,一仍《察世俗》的风格。

裨治文到达广州之后,除了撰写宗教小册子,似乎什么也做不了。他认为“新教传教士到中国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刊印和散发书籍;这也将是他们以后的工作,直到每个说汉语的人都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上帝的伟大作品并认识神的恩典”。^①《中国丛报》创刊以后,编辑这份面向外国人的月刊成了裨治文最主要的工作。

卫三畏最初到中国来的缘由是因为纽约长老会教堂送给广州美部会传教团一台印刷机和一套铅字,他们认为印刷品对改造异教徒的作用很大。卫三畏的父亲建议他到中国去负责这套印刷机,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立即开始学习印刷技术。^②卫三畏到达中国以后就一直帮助裨治文出版《中国丛报》。

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所办中文刊物中影响最大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 1833 年创刊于广州。编辑此刊的“爱汉者”郭士立所代表的荷兰传教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也是新教团体。

总之,第一代来华新教传教士大多利用印刷品这种形式来传教,这是欧美新教团体的一个共同的传统,被称作“无声的福音”(silent evangelism)。^③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新闻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个原因是传教士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文字有特殊的感情,因此希望以书籍、刊物的形式培养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好感,为改变中国的信仰奠定基础。

关于中国人对文字和书籍的感情,马礼逊在 1814 年给大英圣公会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指出:“中国人是一个驯服和通情达理的民族,他们一般都愿意接受劝告和教导,更尊重书籍,他们明显地对此常存感谢的心,绝少有粗暴的表现。”^④麦都思在南洋传教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宗教小册子在分发给中国人时很多人抢着要,麦都思虽然不认为中国人对基督教有兴趣,但是这“表明中

① [美]雷孜智著,尹文涓译:《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3 页。

② [美]卫斐列著,顾均、江莉译:《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 页。

③ 马礼逊也有此认识,他在日记中提到有一位中国天主教徒来向他索要《四福音书》,他由衷地说:“书籍虽然是无声的,但其效果却是有力量的。”参见[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2 页。

④ [英]马礼逊夫人编,顾长声译:《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5 页。